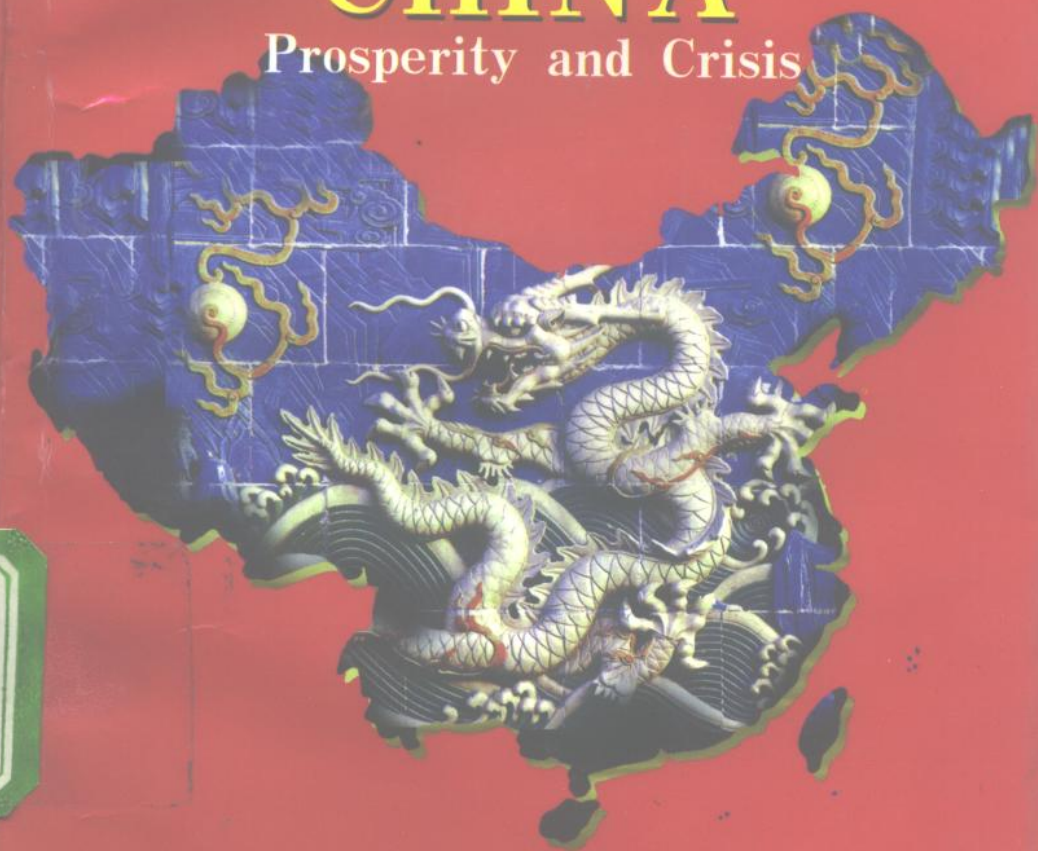


中国大趋势

MEGATRENDS CHINA

Prosperity and Crisis



华龄出版社

中国大趋势
MEGATRENDS
CHINA

史彼克 编著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趋势/史彼克编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6.5

ISBN 7-80082-770-4

I. 中… II. 史… III. 中国-未来学-研究 IV. G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746 号

中国大趋势

史彼克 编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

邮 编:(10003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外文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大32开 10印张 200千字

1996年5月北京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0册

ISBN 7-80082-770-4/C·72

定价:15.8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 中国威胁论	(1)
● 中国复关对世界的影响	(11)
● 中国:新兴的世界贸易大国	(15)
● 国际竞争力	(19)
第二章	(28)
● 21 世纪中国国际政治焦点	(28)
● 中国会分裂吗?	(34)
● 国防新构架与中国对策	(40)
● 台湾,东亚最大的潜在热点	(46)
第三章	(52)
● 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52)
● 中国人口发展与兵源分析	(59)
● 国防建设大趋势	(65)
● 高技术战争与国防建设	(71)
第四章	(76)
● 繁荣与危机:关于中国前景 的七大趋势	(76)
● 中国经济的“失控度”	(84)
● 中国生产力的总体布局	(92)
●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与对策	(103)
第五章	(112)
● 中国反腐败的盲区:集体腐败	(112)
● 人口流动中的“移民”现象	(117)
第六章	(123)
● 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战略	(123)

● 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	(141)
● 国力论·····	(148)
● 海外华人投资·····	(174)
第七章 ·····	(180)
● 我国知识升值的十大趋势·····	(180)
● 国际人才输入的战略·····	(182)
● 人才大战·····	(191)
● 我国劳务输出的问题与对策·····	(202)
第八章 ·····	(208)
● 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战略·····	(208)
● 居民贫困线向我们走来·····	(220)
● 拿什么奉献给失业朋友·····	(225)
● 人口老龄化问题·····	(231)
第九章 ·····	(240)
● 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240)
● 中国不应保持高通货膨胀·····	(253)
● 中国股市的症结·····	(255)
● 中国面临的问题:通胀、停滞、破 产、失业、三角债·····	(263)
● 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268)
第十章 ·····	(274)
● 中国的环境问题·····	(274)
● 中国农业跨世纪的梦·····	(281)
● 中国的水问题·····	(298)
● 耕地的忧患·····	(305)
● 自然资源有偿利用·····	(310)
后 记 ·····	(316)

第一章

中国威胁论

发展是硬道理。具有人类正义感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道理，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

然而，正致力于经济建设、图谋全面发展的中国却面临着日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挑战。有些外国人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或许不一定是世界之福，也许是世界之“祸”。

其实，“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有其一定的背景。由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前景的预测，当前国际社会占上风观点主要是“尽管中国面临着发展速度过高、农业后劲不足、近半数国有企业亏损、地方主义开始抬头等诸多困难和问题，但如政治上不出现重大问题，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中国将在下世纪“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并对 21 世纪以后的世界产生

重大影响。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 12 亿人口且人口规模仍将继续扩大的大国，其领导机制、政治构架、决策程序均与西方或西方化国家不同。因此，周边国家及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军力的加强以及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都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

最近，“中国威胁论”以学术研究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性影响的两个代表性观点，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二是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期特·布朗的“中国粮荒论”。

二

80 年代后，中国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主要表现在：（1）经济增长率保持较高的水平；（2）从低收入阶段开始向中等收入阶级过渡；（3）产业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4）经济总量成倍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4 年 GDP 是 1978 年的 4.24 倍。16 年来，基本上翻了两番，平均 8 年 1 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持续了 23 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天下大治 23 年，中国就会兴旺发达。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样的阶段。

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还包括它是一个大国的兴起。它的兴起不同于一般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所以，我们把它形容为经济起飞与大国兴起。无论按哪一种方法来算，中国在下世纪初经济总量规模将超过美国。外国学者的结论比较积极，大约在 2005—2010 年，中国学者的观点偏于保守，认为

是2020—2030年。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人口到那时可能为15—16亿。所以，我们的人均水平并不高。属于中等收入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国情的两个方面。

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关键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这是世界所关心的。总的来说，有四大影响：首先，这意味着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从1750年的工业革命以来到现在，大约有240多年的时间。欧洲、北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才被纳入到工业社会。这些现代社会和发达社会的人口规模也不过13亿。而我们从1950年到下个世纪的20、30年代，可能把13亿以上的人民纳入到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其次，中国经济起飞将改变和影响21世纪整个世界的格局。中国将成为在世界上非常积极的一股力量，扮演非常特殊的角色，绝不可能等同于其他大国。第三，中国的兴起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中国走的是非西方化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它也不同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兴起被认为是特例。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都集中在它的身上，如人口、失业、环保、粮食等问题，假如中国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第四，中国的兴起将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起重大影响。这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来说是不容置疑的。

让我们换一个思路来讨论这个问题，结果可能更加明朗化。假如中国不发展，假如中国不稳定，那么中国的难民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都将是区域性和世界性的；中国的粮食问题、能源问题也将是区域性和世界性的。所以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中国发展起来恰恰可以解决一些世界性的问题。

诚然，面对中国的经济起飞和大国兴起，某些外国人的心态，或者更具体地说某些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他们发现一个非西方化的，具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现代化，要和他们平起平坐。这一点，对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考验。所以就出现了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美国《外交》季刊上的“亚洲奇迹是不是真的”等若干讨论。这至少表示了西方人的两种观点：一是你发展起来就是威胁；二是即使你发展起来了，这一奇迹是虚的，最后也会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崩溃。不管怎么说，这反映了西方人对非西方人的一种偏见，而不是无知。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布朗的观点，即“中国粮荒”将导致“世界粮荒”。实际上，“中国粮荒论”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变种。之所以这样说，是不排除他的这项研究具有政治目的，或者利用这一研究结论的人怀有其它目的。布朗的文章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连续发表。谁都知道，这种报纸不是学术性期刊，不是探讨学术性问题的场所。而他们要作这篇文章，什么文章？政治文章。否则的话，它不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而且，不断地制造舆论，把这事件

炒大。关于中国粮食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可能有上千种观点，为什么唯独布朗的观点炒得最响，这是值得深思的。

另外，布朗把 1973 年中国粮食产量水平当作 2030 年的粮食产量水平来预测，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而且，布朗把缺乏科学依据的预测结果作为依据作了大胆的推论，即：中国缺粮——向国际市场购粮——世界粮价上涨——全球穷人饿肚子。众所周知，非洲国家很害怕国际粮价上涨。

对中国粮食问题，历史上曾一度流行过悲观论。早在 45 年前，中国大陆只有 5 亿多人口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讲过，这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我相信共产党的政府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靠美国人的面粉，才有出路。”

45 年过去了，中国总人口惊人地翻了一番，由当时的 5.4 亿人口，增长到 1993 年的 11.85 亿，同期粮食总产量由 1.13 亿吨增长至 4.56 亿吨，跃居世界首位。当今世界上有资格、有能力供养十几亿人口吃饭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耕地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生产尚未现代化与机械化，但是中国人在过去的 45 年中却养活了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

中国只用了世界耕地的 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

22%。美国占世界人口的5%，其能源消耗却占世界的1/4。中国缺粮，为什么不能进口美国人生产的粮食，就象美国人消耗其他国家生产的能源一样。

从世界资源公平合理的角度，中国人均耕地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3，理应进口2/3的粮食，而目前中国只进口了2%的粮食消费量，布朗先生就大嚷大叫，这也太不公平了。

以后，中国可能还要进口大量石油，那么会不会出现“中国油荒”导致“世界油荒”论呢？为什么布朗先生对中国问题指手划脚，不去指责消耗资源与能源的美国呢？

三

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强大就是人类的强大，中国的富裕本身就是人类的富裕。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仅是民族之福，更是人类之福。如果世界上80%人的发展，是以另外20%人的贫穷和愚昧、落后和野蛮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发展就是一种畸型的发展。

如果中国未来10——20年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肯定会在下世纪初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当然这是从经济总量来说的，国强不一定民富，人均量还是处在中下水平。

如果中国未来20年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社会不能保持稳定，中国肯定是世界之祸。一个四分五裂、混乱无序、人口庞大的中国将是世界背不起的包袱。当年越

南的难民就搅得世界不能安宁，现在几百万波黑难民搅得欧洲不得安宁，更何况是有 10 多亿人口的中国。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内战，其规模之大，其激烈的程度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中国的灾难必将转化为世界的灾难，漫流全球的难民潮就是它的信使。

中国需要发展，而且中国必须发展。中国如果在未来不能保持 10% 的增长率就没有办法维持。这是因为：

一方面，用一种观点来说，政权合法性是一个政府用非暴力手段得到被统治者认可的能力。一个政权要想赢得人民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人民谋福利，这就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否则，穷则思变，中国这样的大国，“老牛破车”的状态是肯定不能维持的。

另一方面，中国就业压力将持续增加。二十一世纪的二、三十年时间内，中国要面对三大人口高峰：预测表明，2000 年中国总人口将超过 13 亿，下世纪 20—30 年代，中国总人口达到最高峰，人口规模的下限为 15 亿，如果计划生育工作稍有松动，就将出现更大规模的人口群。与此同时，中国还将相继进入老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高峰。2040 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比现在增加 2 亿，约占当时中国人口的 20%。相当于那时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且是在较低收入条件下进入老年社会，抚养负担异常沉重。15—64 岁年龄人口在 2020 年将达到最高峰，约 10 亿人，实际劳动供给人口在 8—8.5 亿之间，形成持久的就业压力。本世纪 90 年代，中国劳动力增长率为 3%，平均每年需安排就业 1500 万人左右。中国就业压力最突出的问题在于，

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将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因此，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保持相当的高速度，没有就业机会的持续扩张，经济增长过程就有可能因失业问题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而中断，后果不堪设想。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就业机会的创造率要低于经济增长率几个百分点，因为，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因此，经济增长不保持一定的速度，就不可能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如果中国能保持 10% 的经济增长率，那么 30 年后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肯定是世界头号强国。所以，如何和一个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和平相处，如何适应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这些问题摆在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的面前。

任何势力都很难阻挡中国的兴起。因为，中国跟日本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强烈依赖于资源输入和产品出口、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非常有限的岛国。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就有这样的好处，即它自己就有一个广阔的市场。更不用说，世界也需要一个开放的中国。

亨廷顿作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家和思想家，发表“文明冲突论”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美国如何继续当世界霸主。在世界两极解体以后，他对日本、欧共体、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这些国家和联合体都不会对美国霸主地位构成威胁，即没有一种在经济上、军事上跟美国抗衡的力量存在。但

这个世界会不会规规矩矩地归美国呢？他认为，一个大国要捍卫其地位，必须有道义有力量支撑，如制度观念、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等。否则，别人不可能顺从它。这种道义的力量来源于价值观的认同，而在当今世界上能导致价值观分异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么几个大的文化板块：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它们从价值观、基本人权、政治制度上与基督教文明都不相同。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由此他认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而将是文化。全球政治的首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出现。“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他特别指出，要提防儒家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联合对西方文明所构成的威胁。断言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必须是武装冲突。并以此为据向美国外交当局献策，希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抑制非西方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但他确实是以一个大思想家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的。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大思想家。但这并不说明他的“文明冲突论”所提出的，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社会确实并存着不同的文明，这些文明之间既有影响，也有合作：既有冲突，也有融合。而且，文明都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否则，这种文明在国际社会上缺乏认同感，是一种落后的文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是彻底批判自己的文明的。甚至连它们思想界的开山鼻祖也认为自己的人种不行，要引进一些先进人种。但当它

在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胜利后，立刻就高唱大和民族优秀论了。日本六十、七十年代经济崛起后，全世界都开始认为日本人既不是丑陋的日本人，也不是劣种的亚洲人了，都开始重视研究日本民族的优质要素了。象儒家文化、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认同感等，马上从劣质要素变成了优秀要素。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这理论、那理论也都出笼了。因此，在国际社会具有认同感的文明，对世界是一种贡献，而并非一定构成对其他文明的威胁。

另一方面，文明的冲突并不一定发展为武装冲突。本世纪 60、70 年代，世界由政治殖民主义时代转入经济殖民主义时代，强国对弱国的统治和剥削由凭借军事优势转变为凭借经济优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也转入“和平竞争”阶段，战争的威胁日渐减少。

四

由于担心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国际上曾出现过“苏联威胁论”，由于担心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榜样力量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苏联解体后，又泛起了“中国威胁论”，且又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这主要是由于 1992 年小平同志南巡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期，在连续二位数增长率情况下，国际社会表现过于紧张，动作出格。

还是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得好：西方国家不应该把中国视为敌人，也不应该孤立中国。连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也不得不提出：“如果

你把中国当作敌人看待，那么，你就会遇到敌人”。

中国复关对世界的影响

美国阻挠中国复关，是基于错误的判断和选择。

中国复关未成，外因是美国阻挠的结果，阻挠的目的是害怕中国迅速强大。对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过高估计，则是其思想根源。

1992 年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对于中国实力的过高估计，引起了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实际上不是中国真正将要威胁他们，而是他们害怕中国迅速强大，“富邻居，不放心”，国际资本需要的是一个不强大，又不十分混乱的中国。中国在 1992 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权威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连续 30 年在 9% 以上高速增长的预测，中国对美连年巨额贸易顺差，都对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形成刺激，仿佛中国在十年以后真要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了。

实际上，对于中国经济前景，分歧很大。一般说来，外国人预计比中国人自己好，中国的年轻人，有权者，有钱者，预计比一般居民好，在知识分子里，留洋新秀们预计比“土生土长的”好，在外国留学生中，甚至有“要发财去中国，要拿诺贝尔奖去中国”之说，因此虽然他们“呼吸到中国的空气都觉得脏”，但还是大

批回来了——对中国的预期这么好，国际上能不害怕吗？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除了有利益和背景的不同外，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二

复关未成给中国进行涉外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中国复关未成，是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一次严重的挫折，在政策上肯定会出现一定的调整。我们对国际社会已经言明：中国如复关不成，将不再履行承诺的义务。如今如果没有反映，岂不是太软弱了吗？

我国为了复关，向国际社会承诺了什么义务？改革价格体系向国际接轨；改革外贸体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包括国营贸易公司的改造，进出口许可证的拍卖，出口补贴的取消，进出口检验权的放开等等；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进口，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增加外贸政策的透明度，按照国际惯例处理国际经济纠纷；按照自由贸易原则规范外资政策，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取消对于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取消对于外资企业的外汇平衡限制，扩大它们的内销市场；开放广告，沿海石油开发，专业服务，金融，航运，旅游六个部门，等等。

以上所承诺的义务，许多已经是事实，并且成为我国改革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走回头路，但是一方面推迟某些义务的实现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再让外国人“为